

乾隆朝粵海關成做

廣珫瑯復刻版作品

施靜菲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乾隆皇帝下令將一組康熙、雍正朝畫珫瑯作品十件送往粵海關，要求粵海關按送到實物樣復刻，費時兩年完成，復刻版成品連同實物樣送回北京造辦處，交乾清宮配匣存儲。成做此類文物的目的，一開始可能就是以典藏為目的而進行的；且這些與原樣相似度百分百的復刻版，或許是乾隆皇帝除了為康熙以來發展的清宮畫珫瑯整理、配匣、定名之外，用來證實其在畫珫瑯技術成熟掌握之例證。而完成的「廣珫瑯」復刻作品送進京後亦被配匣，連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畫珫瑯及景德鎮「洋彩」作品一同存儲在乾清宮的收藏中，更具有完整保存大清發展畫珫瑯文化功業之意義。

清宮畫珫瑯是康熙晚期在內務府造辦處開發的一項新藝術品類，在康熙皇帝主導下，為超越明代五彩、媲美西洋珫瑯而設立作坊，在原有瓷器上彩與掐絲珫瑯工藝基礎上進行實驗，後來又得到廣東工匠的效力及來自歐洲傳教士的協助，而成功燒

製。清宮畫珫瑯歷經康熙晚期、雍正到乾隆三朝之發展，約至乾隆晚期畫上句點，嘉慶時期已經少見。然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乾隆時期的畫珫瑯除了集大成，並將生產線延伸到地方外（景德鎮御窯廠、廣東粵海關）；同時乾隆皇帝還著手整理畫珫瑯作品，

為之配匣且集中收儲陳設在乾清宮配殿（端凝殿），此處成為清宮畫珫瑯最大宗作品的收藏處，共有一千多件。這一千多件作品目前皆收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中（部分隨附木匣留存），並可對應到北京故宮收藏的陳設檔案清冊。這些作品包括我們較熟

知的「玻璃胎畫珫瑯」、「銅胎畫珫瑯」、「磁胎畫珫瑯」及「宜興胎畫珫瑯」四種材質，此外在同一檔案中，我們還看到有「磁胎洋彩」及「廣珫瑯」的紀錄。二〇〇八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華麗彩瓷」特展中，展出景德鎮製作的「洋彩」作品，金彩之運用及洋花之裝飾，都讓人對「洋彩」之華麗風格特色留下深刻印象。而相對來說，廣東粵海關受命成做的「廣珫瑯」，則尚未受到足夠的關注。「廣珫瑯」在地方原有珫瑯手工業的基礎上，加入了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的風格。這其中，最極端的例子，莫過於康、雍兩朝畫珫瑯的復刻版作品，一方面展現了官方文物製作之規制如何從宮廷貫穿到地方，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窺見乾隆時期廣東地區珫瑯工藝之發展。

從北京到廣東：照樣成做

《內務府造辦處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乾隆四十年〈行文〉：

（十一月）十九日，員外郎四德、庫掌五德、福慶來說，太監胡世傑

交金胎西洋法瑯碗一件隨楠木匣一件、銅胎西洋法瑯花籃一件隨楠木匣一件、銅胎西洋法瑯鉢盂一件、銅胎西洋法瑯方酒鉢一件，俱係康熙御製款。銅胎西洋法瑯杯盤一分，係雍正年製款。銅胎畫法瑯仿成窯花樣蓋罐一對隨楠木匣、銅胎畫法瑯包袱式蓋罐一件隨楠木匣、銅胎畫法瑯壺一件隨楠木匣，俱係雍正年製。傳旨，將法瑯鉢盂酒鉢盃盤各配楠木匣盛裝，得時並法瑯壺碗花籃罐俱發往粵海關，交德魁照樣各成做一件，不要廣法瑯，務要洋法瑯，亦要細緻燒乾隆年製款，欽此。於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員外郎四德、五德，將粵海關監督德魁送到法瑯器十件，隨做樣法瑯器十件持進，交太監如意呈進，交乾清宮做樣法瑯器配匣，另有記載訖。

從上述紀錄中，我們看到，一組共十件康熙、雍正銅胎畫珫瑯作品被當作樣本送到粵海關，要求照樣成做並細緻寫上「乾隆年製」款，於四十二年十一月成品暨原樣共二十件送至北京，交回乾清宮配匣存儲。這

條史料的意義相當重大，依序分析如下：

1. 該文獻顛覆了我們對乾隆朝清宮畫珫瑯面貌的認識，這些看似對康熙、雍正朝畫珫瑯作品百分百模仿的復刻版作品（參見附表）（註一），原來皆被定位為在北京的清宮造辦處珫瑯作中製作。也就是說，若無此《活計檔》紀錄之發現，我們可能會停留在過去的看法，誤以為這些模仿前朝風格的作品，皆是在造辦處珫瑯作坊中製造。但從上述的《活計檔》描述，加上這些作品所附之乾隆時期木匣上題款，與清宮陳設檔的交叉比對，我們應該將它們更正為粵海關成做的「廣珫瑯」作品。此紀錄提醒我們，不僅這些復刻版作品，以及其它風格相近且書有「乾隆年製」的銅胎畫珫瑯作品，都需要重新被評估定位。粵海關成做清宮「廣珫瑯」活計之始末及互動關係，筆者已在另一專文中論述，在此不擬贅述。（施靜菲、王崇齊，〈乾隆朝粵海關成做之「廣珫瑯」〉，《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



圖一b 清 康熙 銅胎畫珫瑯小圓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入完整保存大清發展畫珫瑯文化功業之一環。(施靜菲,《日月光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二,頁一五〇—一六〇)

非常幸運的,文獻中提到的這些作品,直到清末民初時,大多仍然連同木匣完整保留在清宮中(絕大多數都在收藏清宮畫珫瑯最集中的乾清宮配殿中),隨著文物播遷,今日除少數個別作品外,幾乎皆收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中。近年來由於清宮檔案之陸續公布刊行,再加上國家型數位計畫支持下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典藏之整理與拍攝,使「廣珫瑯」的區辨成為可能執行的工作。在《活計檔》中可見,景德鎮御窯廠成做的「洋彩」及粵海關成做的「廣珫瑯」作品,送進清宮後,與其他造辦處成做的各材質畫珫瑯都被收入乾清宮內集中管理。在記錄乾清宮珫瑯相關物品的《珫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以下簡稱《陳設檔》)(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中,即有許多「廣珫瑯」作品的紀錄;而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作品隨附木匣上之品名題款,以及

主要根據木匣上題款而記錄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清冊中,也都可以見到「廣珫瑯」的出現。

推測乾隆朝在整理清宮畫珫瑯作品時,有時候可能為了區別銅胎畫珫瑯在北京與廣東兩個不同產地,而使用了「廣珫瑯」的名稱,如同在區別瓷胎畫珫瑯在北京與景德鎮之不同產地,使用了「洋彩」的名稱。就目前乾隆時期銅胎珫瑯作品隨附的木匣刻款來看,帶有「廣珫瑯」(及「洋珫瑯」)刻款的例子,從風格來看明顯專指粵海關成做珫瑯;但檔案中「廣珫瑯」、「洋珫瑯」名詞的使用並未十分一致,必須視前後文之脈絡而定。前述《活計檔》乾隆四十二年〈行文〉引文中「不要廣法瑯,務要洋法瑯」。我們若從一般《活計檔》中的紀錄來看,「廣珫瑯」很多時候指涉廣東製作送進宮的珫瑯作品,「洋法瑯」則泛指自西洋進口的珫瑯作品,或以西洋傳來畫珫瑯、內填珫瑯(champlevé)等技術製作的作品。但同時,在提及「廣珫瑯」或「洋珫瑯」時,也經常用來指稱技法之區



圖一a 清 乾隆 銅胎廣珫瑯小圓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殿,陳設收藏有與滿清皇室統治密切相關的物品。《活計檔》中以〈乾清宮〉為標題的獨立紀錄,計有乾隆三、四、五、六、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年等,根據學者研究指出,在乾清宮中展開清宮典藏的分等整理,為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重要的計畫之一(約1738-49年之間),特闢一專章記錄乾清宮文物之分類、評等分級、製錦配匣與收藏陳設。

(Yu, Hui-dun, "The Intersection of Past and Present: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Bronzes",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h.D. thesis, 2007, pp.75-85)之後在檔案中雖未另闢一專章,但不時仍有與乾清宮收藏相關的紀錄出現,例如前述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到四十二年(一七七七)的紀錄中,就提到將原本收儲在乾清宮康熙、雍正朝珫瑯器十件送往粵海關進行仿製,費時兩年完成後,再送回北京造辦處交乾清宮配匣存儲。

而進一步來看,此紀錄讓我們可得

知,乾隆皇帝在乾隆朝中晚期對於粵海關成做珫瑯品質具有一定的信心,將珍貴的前代作品當作實物樣發往粵海關進行復刻。這類活計對乾隆皇帝而言,應當別具紀念意義。因為成做此類物品的目的,一開始就並非為實用而做,而可能是以典藏為目的而進行。(余佩瑾,〈乾隆皇帝與清宮瓷器典藏:以畫珫瑯和洋彩為例〉,《故宮文物月刊》,三六九期,頁五二—五五)且這些與原樣百分比相似的復刻版,或許是乾隆皇帝除了為康熙以來發展的清宮畫珫瑯整理、配匣、定名之外,用來證實其在畫珫瑯技術與風格上成熟掌握之例證。另一方面,我們從相應的實物也應意識到,此時不僅清宮造辦處珫瑯作在風格及技術上有集大成之成熟表現,粵海關在廣州亦能招集具有模仿功力、技術純熟之匠藝,成功完成交辦任務。完成後的「廣珫瑯」被送進清宮配匣,連同康雍乾三朝造辦處畫珫瑯及景德鎮「洋彩」作品一同存儲在乾清宮的收藏中,加

究集刊》第三十五期,二〇一三,頁八七—一八四)

2. 乾清宮從雍正時期以來作為皇帝平日上朝、接待外來使臣的重要宮

二五四	銅胎畫珫瑯五形西番花黃地大碗 (康熙年製)	一件
二五五	銅胎畫珫瑯五形西番花黃地大碗 (雍正年製)	一件
二五六	銅胎畫珫瑯五形西番花黃地大碗 (康熙御製帶盒)	一件
二五七	銅胎畫珫瑯五形西番花黃地大碗 (雍正年製)	一件
二五八	宜興胎畫珫瑯五形西番花黃地大碗 (康熙年製)	一件
二五九	宜興胎畫珫瑯五形西番花黃地大碗 (康熙御製帶盒)	一件
二六〇	宜興胎畫珫瑯五形西番花黃地大碗 (雍正年製)	一件
二六一	宜興胎畫珫瑯五形西番花黃地大碗 (雍正年製)	一件
二六二	宜興胎畫珫瑯五形西番花黃地大碗 (雍正年製)	一件

圖三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二輯 卷四 《端凝殿左右屋》

張宗蒼畫珫瑯器一軸
十六字珫瑯花書一軸
張宗蒼畫珫瑯器一軸
旨者文致祥官所撰勅諭子展配賦等樣子於任南道
依前做法照樣做來欽此
於四十二年六月初一日隨同廣東五德府蘇州
王賢爵職一分持進文太監呈知
進文如查存記
十九日員外郎四德庫掌五德府廣東文監
胡世傑文
金胎西洋法珫瑯一件 隨檢木匣一件
銅胎西洋法珫瑯花籃一件 隨檢木匣一件
銅胎西洋法珫瑯鉢一件 隨檢木匣一件
銅胎西洋法珫瑯方碗一件 隨檢木匣一件
銅胎西洋法珫瑯打盤一分 隨檢木匣一件
銅胎西洋法珫瑯成盒花樣蓋碗一對 隨檢木匣
銅胎西洋法珫瑯包袱式蓋碗一件 隨檢木匣

銅胎畫珫瑯一件 隨檢木匣
旨將法印鉢盂酒銀盃各配均木匣武裝府時並法印
畫珫瑯花籃蓋碗俱發往粵海關文德魁製成欽此
件不要廢法務要洋法印亦要細煇燒乾隆年製
欽此
於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員外郎四德庫
法印器一件 隨檢法印器十件 持進文太監如
進文如查存記
二十二日員外郎四德庫掌五德府廣東文監
太監胡世傑文
旨將法印鉢盂酒銀盃各配均木匣武裝府時並法印
畫珫瑯花籃蓋碗俱發往粵海關文德魁製成欽此
件不要廢法務要洋法印亦要細煇燒乾隆年製
欽此
於本月二十三日員外郎四德庫掌五德府廣東
文監胡世傑文

圖二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8 乾隆40年11月 《行文》

別，例如廣東工匠擅長的浮雕透明珫瑯 (bass-tile) 等工藝，而「洋珫瑯」則與「西洋珫瑯」、「畫珫瑯」互通，或技術來自西洋的畫珫瑯、內填珫瑯等工藝，則經常用在對比描絲珫瑯之時出現。

不過就筆者有限的眼界所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珫瑯作品隨附木匣上刻款題名「廣珫瑯」、「洋珫瑯」的例子，皆指涉粵海關成做作品。究其原因，或許與《活計檔》之紀錄有關，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四日《行文》載：「催長大達色、金江、舒興，將粵海關送到洋珫瑯蓋罐一件、洋珫瑯鈹一對、洋珫瑯瓶一對、洋珫瑯提梁壺一對、洋珫瑯小圓盒一對隨原作樣法瑯器五件，：持進，交太監常寧呈覽。」（《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四五，乾隆四十七年五月，《行文》，頁四〇四～四〇五）《活計檔》中對此批粵海關復刻版作品之稱呼，可能即是不匣刻款上「洋珫瑯」名稱之由來；我們可將此紀錄對應到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中的同類作品及木匣，例如隨附木匣刻款品名為《乾隆年製銅胎洋法瑯小圓盒一對》（故珫

二九八、二九九／呂四七五—二〇〇）（圖一 a）、《乾隆年製銅胎洋法瑯提梁壺一對》（故珫三〇二、三〇三／呂四七五—七三三），而它們的原版則是康熙朝畫珫瑯作品（圖一 b）。因此，木匣刻款出現以「洋法瑯」來稱呼本文所歸納的粵海關成做「廣法瑯」一類作品，即意指粵海關成做的洋式珫瑯作品。

本文將以此批乾隆皇帝下令粵海關成做仿製康熙雍正朝的畫珫瑯作品出發，做為辨識清宮特傳粵海關製作「廣珫瑯」風格之基準品。一方面利用清宮《活計檔》、《陳設檔》與現存實物及木匣刻款交叉比對之方法，將「廣珫瑯」放回適當的歷史脈絡中；另一方面，以此結果為基礎，歸納出「廣珫瑯」風格及款識特色，希望對未來區辨其他公私收藏中「廣珫瑯」之工作有所助益。利用清宮《活計檔》、《陳設檔》與現存清宮舊藏實物及木匣題名刻款進行比對之工作，或以北京故宮博物院朱家潛對清宮漆器及畫珫瑯器之考察為濫觴（《清代畫珫瑯器製造考》，《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二～三，頁六七

七六；朱家潛，〈清代漆器概述〉，《文物》，一九九四（二）；廖寶秀進行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清宮「洋彩」區辨工作之執行，即進一步具體將《活計檔》（圖二）、故宮圖書館收藏的《陳設檔》，以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圖三）（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出版社，二〇〇四），與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及隨附木匣進行比對確認（廖寶秀，〈乾隆瓷胎洋彩綜述〉，《華麗彩瓷：乾隆洋彩》，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八，頁十～十四）。近來北京故宮博物院楊勇及劉岳亦據前述檔案、清冊與實物層層相扣之立基，試圖找出原重華宮所藏、康熙與雍正兩位皇帝御賜乾隆皇帝之禮物，據此為無款器訂定年代下限，或進一步從可確定年代標準器歸納推論其他無款器之時代。（楊勇、劉岳，〈關於故宮藏幾件清代無款器物的年代〉，《文物》二〇一三年第七期，頁七五～八二；《篤慕永思用昭世守：故宮收藏的御賜品》，《收藏家》二〇一三（七），頁三～十四）筆者在前述學者之研究基礎上，檢視清宮「廣珫瑯」與檔案、木匣題款等材料

料，並適時加入風格分析進行比對，作為文獻所提「廣珫瑯」作品與實物比對之一個案例呈現。

粵海關成做之復刻版作品

從前述《活計檔》乾隆四十年《行文》紀錄中，我們看到一批共十件康熙、雍正銅胎畫珫瑯做樣器送到粵海關，要求粵海關監督德魁照樣成做並細寫上乾隆年製款，成品暨原樣共二十件於兩年後（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送至北京。而該紀錄最後留下的伏筆「交太監如意呈進，交乾清宮做樣法瑯器配匣，另有記載訖」的內容，則出現在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記事錄》中：「員外郎四德、五德將粵海關送到金星玻璃數珠一百八盤、紫檀木盒、鐵鉢四件、炕老鶴翎鞘小刀四把，法瑯顏料一箱重六十四斤八兩、金胎法瑯碗一件、銅胎法瑯花籃一件、銅胎法瑯鉢一件、銅胎法瑯方酒鉢一件、銅胎法瑯盃一分、銅胎法瑯份成盒花樣蓋碗一對、銅胎法瑯包袱式蓋罐一件、銅胎法瑯壺一件，俱乾隆年製款，以上

共計十件，做樣法瑯器十件呈覽。奉旨：金星玻璃數珠交金在恩慕寺藥師佛上掛，原隨紫檀木盒打磨好呈覽，鐵鉢出處，着炕老鶴翎小刀交四執事，顏料交法瑯處，新到法瑯器十件內金胎法瑯碗一件，交圖明阿帶去照樣燒造一件，具配蓋成一對，做樣法瑯器十件交乾清宮，其新到法瑯器九件內，成對蓋罐一對配楠木匣一件，盃盤一份配楠木匣一件，下剩瑛瑯器各配楠木匣一件盛裝，具刻名色簽字。欽此」（《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四十，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記事錄〉，頁四七〇）。

透過此第二條紀錄之補充說明，我們知道關於此活計更多的資訊，其中，粵海關復刻的「金胎法瑯碗」要多做一件並配蓋成一對；木匣要刻上名色簽字（亦即刻上品名之義）。又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初八日：「再新配做法瑯蓋碗一件，週身有火霞，交圖明阿仍用此胎股另往好裡燒造來，做樣碗交茶房」。於十二月十五日將粵海關送到法瑯蓋碗一對、元盒大小六對，呈進訖」。在這裡，顯然粵海關受命燒製該「法瑯蓋碗一對」之工作

此取得更接近此文物在清宮之陳設與存儲狀況。對照到當時的帳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二輯（卷四端凝殿左右屋），列四二七（木箱）——一三，「金胎西洋瑛瑯盤一件」（帶匣邊損康熙年製）。道光十五年《瑛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中之紀錄為「金胎西洋瑛瑯盤壹件（重三兩九錢）」，該檔案所列康熙金胎畫瑛瑯作品清單中，考慮此陳設檔對應的位置，應當就是列字號這一整批一千多件的相關作品，而康熙金胎瑛瑯碗之相關紀錄僅此一筆，因此可推論此作品即為文獻中提到之作品。該作品目前並無隨附木匣，然其在前述《活計檔》之紀錄中應為「金胎西洋法瑯碗一件隨楠木匣一件」。

G1實物〈清乾隆銅胎廣瑛瑯黃地花卉蓋碗〉，目前收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中，文物編號「故瑛一〇一／列六三四」。對照《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第二輯：列六三四「銅胎瑛瑯蓋碗」（帶匣東三十二號乾隆年製）。現存隨附木匣題款：「乾隆年製銅胎瑛瑯蓋碗一件」。從款識風格判斷，此作品應屬「廣瑛瑯」。據

經過一些曲折後，終至達成；且此處提及的「做樣碗」應當就是前述粵海關做好送上來的新到金胎瑛瑯碗一件，又交粵海關監督圖明阿回去另燒一件具配蓋成一對的那件樣碗，這樣算來，包括此件做樣碗以及後來再補燒完成的「法瑯蓋碗一對」，乾隆時期的粵海關應該一共燒製了三件同款式的瑛瑯蓋碗（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初八日交茶房的「做樣碗」一件，十二月十五日補燒完成後，粵海關送進的「法瑯蓋碗一對」）。

從目前可以掌握的材料來看，國立故宮博物院現存有「廣瑛瑯」（及「洋瑛瑯」）刻款木匣中的作品，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清宮《瑛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標為「廣瑛瑯」（及「洋瑛瑯」）的作品，除少數例外，大致吻合。以下即依此原則進行上述檔案引文中所提之二十件作品之比對。根據上述《活計檔》中對此項活計始末的描述，對照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實物，以及部分留存木匣之題款，並與北京故宮所藏乾清宮陳設檔案進行交

王竹平指出，此作品胎質經化驗確認屬含金率較低的銅金合金，大約為五〇六K金胎。（王竹平，前引文，頁一七八～一七九）如前所述，除乾隆四十年（行文）之紀錄外，亦符合前述《活計檔》中另外兩條相關紀錄之描述。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金胎法瑯碗一件，交圖明阿帶去照樣燒造一件，具配蓋成一對」；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初八日：「再新配做法瑯蓋碗一件週身有火霞，交圖明阿仍用此胎股另往好裡燒造來，做樣碗交茶房」。於十二月十五日將粵海關送到法瑯蓋碗一對、元盒大小六對，呈進訖」。此件單件之樣碗應當就是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圖明阿受命帶去做樣的單件瑛瑯蓋碗。

從附表所列的圖版對照來看，粵海關製作的復刻版作品與康、雍兩朝的十件作品，不論構圖細節或是配色，幾乎一模一樣難以區分，可說是清宮畫瑛瑯廣東復刻版之最佳例子。然雖然幾乎是相似度百分之百的模仿，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器形的細微差別，並歸納出一些「廣瑛瑯」之描繪風格特點。首先，廣東復刻版花卉

又比對，我們可以表列《活計檔》引文中提到的文物。（附表）由於目前材料公布之限制，或有複數以上文物可以對到《活計檔》引文，以下舉例說明舉列文物之考慮過程，作為未來檢證或修正之依據。不過，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帶有這樣清楚脈絡的「廣瑛瑯」實物，僅限於前述原保存於乾清宮配殿，即現今絕大多數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此批作品（少數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未來若要再進一步推求其他不在此批收藏中的「廣瑛瑯」作品，就需要以此批作品為標準品，從風格和款識歸納出「廣瑛瑯」之特色，交叉比對、相互印證來區辨。

現舉 Q1、G1 兩件對照組作品為例進行說明：

Q1實物〈清康熙金胎畫瑛瑯黃地花卉碗〉，目前收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中，文物編號「故瑛二六九／列四二七——一三」，其中「故瑛二六九」為遷臺後博物院編列之文物統一編號，而千字文舊號則為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紫禁城文物時編列，我們可以依

的描繪在使用漸層色彩形塑花瓣層次時，經常有明顯留白的傾向，色彩對比相對較為強烈（例如 G1、G2）；而模仿時因為需計算裝飾母題之相對位置，有時小心翼翼怕畫不下，反而留出空白或呈現較為舒朗的佈局（例如 G6、G8）。此外，也出現一些因為對實物模仿而產生的有趣現象，可作為判斷是否為一手復刻版之依據。例如 G8 藍彩紋飾描繪，相對原樣 Q8 稍有簡化，原樣壺身中心蕃蓮花上方左右伸出的枝葉不對稱的意外狀況，在復刻版中卻反而展現對稱。而原本 G8 有另兩組可能的候選作品，國立故宮博物院與北京故宮博物院亦另收藏有其他單件或成對的白地藍花提梁壺（圖四）。然從風格上來判斷，其它這些白地藍花提梁壺，更像是從 G8（一手復刻版）再翻刻來的二手復刻版，從跟隨描繪對稱的枝葉，以及紋樣更趨簡化的程度可以窺見（註二）。又如 G7 包袱蓋罐複雜的多層次裝飾令人眼花撩亂，看起來復刻版雖然也幾乎照樣畫葫蘆，但就在包袱中內裡外翻之處，我們看到許多原本紋樣被切割不完整的部分（綠色布面處最清楚），

附表：粵海關成做的「廣珐瑯」復刻版

康熙、雍正朝做樣畫珐瑯	粵海關成做「廣珐瑯」
 	 
<p>Q1清 康熙 金胎畫珐瑯黃地花卉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珐269 列427-13 《點查報告》：列427（木箱）-13：「金胎西洋珐瑯盤一件」（帶匣邊損康熙年製） 無木匣 《陳設檔》：「金胎西洋珐瑯盤 壹件（重三兩九錢）」</p>	<p>G1清 乾隆 銅胎廣珐瑯黃地花卉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珐101 列6 《點查報告》：列634「銅胎珐瑯蓋碗」（帶匣東32號乾隆年製） 現存木匣款識：「乾隆年製銅胎珐瑯蓋碗一件」 《陳設檔》：「銅胎珐瑯蓋碗 壹件」</p>
 	 
<p>Q2清 康熙 銅胎畫珐瑯黃地牡丹花籃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故116765 列360-49 引自故宮博物院編 《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瑯器編·清畫珐瑯》 《點查報告》：列360-49「銅胎珐瑯花籃 一件」（帶蓋破） 現況無木匣 《陳設檔》：「銅胎珐瑯花籃 壹件（逆珐補蠟）」</p>	<p>G2清 乾隆 銅胎廣珐瑯黃地牡丹花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珐190 列623 《點查報告》：列623「銅胎廣珐瑯花籃」（帶匣東50號乾隆年製） 現存木匣款識：「乾隆年製銅胎廣珐瑯花籃一件」 《陳設檔》：「銅胎廣珐瑯花籃 壹件」</p>



圖四 清 乾隆 銅胎廣珐瑯白地藍花提梁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在復刻版上，似乎傾向當做完整圖樣來做處理。若更進一步從「廣珐瑯」的「乾隆年製」款識來觀察，更可以看出其中之細微差異，我們見到粵海關的復刻版盡力仿模清宮畫珐瑯康熙、雍正朝畫珐瑯之寫款形式，但又未經意透露出更多筆意的表現。

上述例子相當具有關鍵性，若以前述十件作品作為「廣珐瑯」之標準品，分析出不同於造辦處製作清宮畫珐瑯之風格特點，除了修正前人對此類作品的判斷外，也展現了從檔案、清冊、木匣到實物風格與款識互交叉又比對之做法，可為區辨「廣珐瑯」提供重要的參考標準。

結論

本文由一條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的《活計檔》紀錄出發，在前人工作成果的基礎上，將「廣珐瑯」放回適當的歷史脈絡中。首先，利用清宮《活計檔》、《陳設檔案》與現存實物及木匣刻款之交叉比對之方法，從清宮傳世實物中，整理出清宮舊藏「廣珐瑯」復刻版之面貌，修正過去將許多「廣珐瑯」作品誤以為是清宮造辦處

所製之看法。再者，透過解讀清宮發樣要求粵海關成做「廣珐瑯」之脈絡，我們也看到特傳旨意製作的「廣珐瑯」作品，在成做後被送進宮中配匣，連同康熙乾隆三朝造辦處畫珐瑯及景德鎮「洋彩」作品一同存儲在乾清宮的收藏中，加入完整清宮畫珐瑯發展，呈現大清文化功業之一環。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

註釋

1. 王竹平在討論乾隆朝粵海關與「仿前朝樣式」之珐瑯作品時，相對於「原版」樣本，使用了「復刻版」的稱呼，貼合我們對此批珐瑯作品意在重現過去經典的認識，因此本文亦借用此一名稱來稱呼此類作品。王竹平在《康熙與乾隆款浮雕珐瑯碗的製作及其關聯性》，《故宮學術季刊》，第三〇卷第四期，二〇一三，頁一七二—一七八。
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另一件「乾隆年制」款藍地白地花執壺（故珐三〇四七五—四〇）（圖四），外型雖亦近似，然連蓋之鍍金壓手部分上揚，且紋飾描繪較顯形式化，尤其是壺蓋下緣一圈卷草紋被簡化成幾何性線條之現象最為明顯，再加上底款為「乾隆年製」四字雙圈款，與雍正朝作品差異較大，故應非一手之復刻版。



Q5清 雍正 銅胎畫珐瑯黃地九壽杯、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 488、489 列469
《點查報告》：「銅胎畫珐瑯黃地五彩花盃盤 二份」(帶匣西1號雍正年製堆料款)
現況無木匣
《陳設檔》：「銅胎畫珐瑯五彩花黃地盃盤 貳份」



G5清 乾隆 銅胎廣珐瑯黃地九壽杯、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609、610 列617
《點查報告》：「銅胎珐瑯盃盤 一分」(帶匣東45號乾隆年製)
現存木匣款識：「乾隆年製銅胎珐瑯杯盤一件」
《陳設檔》：「銅胎廣珐瑯盃盤 壹分」



Q6-1清 雍正 銅胎畫珐瑯白地花蝶紋蓋罐一對 (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 503 列266
《點查報告》：「銅胎畫珐瑯仿成窰花樣蓋罐 一對」(雍正年製盒破壞)
現況無木匣
《陳設檔》：「銅胎畫珐瑯仿成窰花樣蓋罐 壹對」



G6-1清 乾隆 銅胎廣珐瑯花蝶圓蓋罐一對 (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449 列621
《點查報告》：「銅胎廣珐瑯圓蓋罐 一對」(帶匣東56號乾隆年製)
現存木匣款識：「乾隆年製銅胎廣珐瑯圓蓋罐一對」
《陳設檔》：「銅胎廣珐瑯圓蓋罐 壹對(吊瑯補蠟)」



Q3清 康熙 銅胎畫珐瑯藍地開光鉢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459 列360-61
《點查報告》：「銅胎畫珐瑯鉢盂 一件」(帶蓋破)
現況無木匣
《陳設檔》：「銅胎畫珐瑯鉢盂 壹件」



G3清 乾隆 銅胎廣珐瑯藍地開光鉢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688 列420
《點查報告》：「銅胎珐瑯鉢盂 一件」(帶匣乾隆年製)
現況無木匣
《陳設檔》：「銅胎畫珐瑯鉢盂 壹件」



Q4清 康熙 銅胎畫珐瑯黃地菊花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1029 列360-42
《點查報告》：「銅胎珐瑯四方滴鉢 一件」(帶蓋)
《陳設檔》：「銅胎畫珐瑯四方滴鉢 一件」(帶蓋)



G4清 乾隆 銅胎廣珐瑯黃地菊花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 500 列425
《點查報告》：「銅胎珐瑯廣珐瑯四方滴鉢 一件」(乾隆年製)
《陳設檔》：「銅胎畫珐瑯四方滴鉢 壹件」



年雍正
製正

Q8清 雍正 銅胎畫珐瑯白地藍花執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229 列496
《點查報告》：「雍正年製銅胎畫珐瑯壺 一把」
(帶匣西6號)
現況無木匣
《陳設檔》：「銅胎畫珐瑯壺 壹件」



年乾隆
製隆

G8清 乾隆 銅胎廣珐瑯白地藍花執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553 列649
《點查報告》：「銅胎畫珐瑯壺 一個」(帶匣東44
號乾隆年製)
現存木匣款識：「乾隆年製銅胎畫珐瑯壺一件」
《陳設檔》：「銅胎畫珐瑯壺壹件」

※左欄康熙、雍正朝做樣畫珐瑯作品幾乎均為孤件，在《陳設檔》與《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之品名紀錄輔證下，可確定即是《活計檔》中提到的文物；右欄乾隆朝畫珐瑯則幾乎皆有一組以上的複數同類作品，雖無法百分百確認是《活計檔》中提到的文物，然本文除了交叉比對《陳設檔》、《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與現存木匣外，亦根據作品的風格及相關脈絡（例如單件或一對，或記錄順序與前後件之關係）做進一步推斷，舉列最接近的作品。

※右欄為粵海關成做的「廣珐瑯」作品，雖然部分清宮的木匣刻款及相關清冊文字紀錄中並未註明「廣珐瑯」，但就其紋飾風格及款識特點判斷，應為「廣珐瑯」作品。



年雍正
製正

Q6-2清 雍正 銅胎畫珐瑯白地花蝶紋蓋罐一對(之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 504 列266
《點查報告》：「銅胎畫珐瑯仿成窰花樣蓋罐 一對」(雍正年製盒破壞)
現況無木匣
《陳設檔》：「銅胎畫珐瑯仿成窰花樣蓋罐 壹對」



年乾隆
製隆

G6-2清 乾隆 銅胎廣珐瑯花蝶圓蓋罐一對(之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450 列621
《點查報告》：「銅胎廣珐瑯圓蓋罐 一對」(帶匣東56號乾隆年製)
現存木匣款識：「乾隆年製銅胎廣珐瑯圓蓋罐一對」
《陳設檔》：「銅胎廣珐瑯圓蓋罐 壹對(吊瑯補蠟)」



年雍正
製正

Q7清 雍正 銅胎畫珐瑯包袱式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221 列484
《點查報告》：「銅胎畫珐瑯包袱式蓋罐 一件」
(帶匣西8號雍正年製微傷)
現況無木匣
《陳設檔》：「銅胎畫珐瑯包袱式蓋罐 壹件」(送瑯補蠟)



年乾隆
製隆

G7清 乾隆 銅胎廣珐瑯包袱式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560 列641
《點查報告》：「銅胎畫珐瑯包袱式蓋罐 一個」
(帶匣東43號乾隆年製)
現存木匣款識：「乾隆年製銅胎畫珐瑯包袱式蓋罐一件」
《陳設檔》：「銅胎廣珐瑯包袱式蓋罐壹對(吊瑯)」(目前尚未查對到單件之紀錄)